

思想

## 中国宏观经济是否面临变局?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最近通货膨胀的问题开始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国内和国际财经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都在这个时候纷纷出来预测中国这一轮的经济繁荣是否该到了结束的时候。我的一位经济学家同行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中国从下半年开始就会进入通货膨胀期。有的外资银行甚至用了“也许好日子即将结束”这样的醒目标题。有人说,这一轮的经济繁荣是从2003年SARS之后开始的,也有人至少可以说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算起。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的最优组合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

这些日子,一些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往往注意到一个观察中国通货膨胀的有趣方法,他们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与消费价格指数(CPI)之间的差值理解为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方向标。原因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在2001年

了。于是,有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行将进入通货膨胀和增长下降的时期。其实,由于种种原因,价格指数变化在中国从来都不可全信,因为它们给出的信息总是有局限的。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是否出现变局,固然有一些短期的现象值得关注,但那些肯定不是重要的现象。有些现象是可以政策性的和技术性的手段来应对的。比如,央行可以通过它的短期货币政策来调整一些总量关系。但这并不改变中国宏观经济繁荣的总体画面。中国的商业周期有它的特殊性,未必可以用常规眼光来看待它。

什么是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现象呢?我认为,总量关系掩盖着的还是经济结构性问题。而这些矛盾在短期里不可能出现变化。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呢?这个结构性问题与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关系是什么?

所谓结构性问题,可以简单地从中国经济10年来的外部不平衡状况反映出来。固定的汇率,强劲的出口,持续恶化的贸易条件,占GDP 50%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GDP增长,地区的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经济的繁荣依赖制造业

的设备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这些特征都刻画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如何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呢?我认为从宏观上讲,由外部持续增长的盈余(贸易项目的和资本项目的)带来的流动性的增长必然让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低利率和高投资的总量政策,因为没有高投资,就无法保持宏观总量上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而不是相反。

中国显然已经认识到这种高投资的总量政策需要与改善投资结构的政策和投资效率的政策很好地搭配起来,因为必须把投资分



创意上海

## 服务经济依然是上海的“短腿”

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如果能够站在全局高度,聚焦国家战略,顺应发展趋势,把握前进方向,正确城市定位,那么,上海有条件有能力走出一条服务经济比较发达、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资源消耗持续降低、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的新路。

第九次党代会为上海发展给出了一个大思路,那就是“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以此作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供“战略性产业支撑”。这个战略思路的形成,主要出自三个对上海未来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的综合考虑。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全球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开放,融入全球化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上海对外经济联系的空间迅速拓展。由此带来两个必须认真谋划的问题:一方面,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效动员和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我们直面国际领域越来越激烈的经济竞争,就看你有没有能力积极应对和最终取胜。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大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一个大国崛起的现实谁也不能否认。由此也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不仅为上海的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且也要求上海能够为全国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全过程的支持。

第三个因素是上海要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现代中心城市的架构。中心城市功能,包括消费功能、生产功能和服务功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提供的外部条件,以及我国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对投资品的强大需求,两者合力,促使上海城市生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服务功能则由于政府规制和市场约束长期受到抑制。现在,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受到能源、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的瓶颈制约,上海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活力开始递减和衰竭,为此,产业层次的提升、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综合上述原因,其实可以集中到一点:无论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国际竞争,还是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还是促使上海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要求上海增强集聚能力和辐射能力,发挥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城市服务功能的发挥,需要产业载体的支撑。这个产业载体就是现代服务业。换句话说讲,城市综合服务功能能否有效发挥,直接取决于服务产业能否克服“短腿”现象。因此,上海必须实现以三二一为序的发展思路转变,加快金融服务业、航运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创意产业发展的步伐,通过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和意识流的汇集,带动服务业整体发展,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战略性产业支撑。只有这样,上海才有可能突破资源要素的约束,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激活发展潜力,巩固发展地位,实现自身的发展战略目标。

今天的上海,具备着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有利条件:一是WTO后过渡期将有一个服务业外资集中进入的过程,这就为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沿海大城市带来了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二是上海地处我国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的交汇点,而中国的这两个地带人口密度最高、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活动最活跃。近十多年来制造业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增加、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分别对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产生强烈需求。市场体系发达,要素流动顺畅,内外联系密切,又提供了增加服务业供给的可能。三是中央政府重视上海,跨国公司看好上海,全球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集聚上海,上海的百姓迫切希望发展上海。

天时、地利、人和,内在要求、外部条件,发展思路,汇集当前,汇集上海,能否把握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就取决于我们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如果能够站在全局高度,聚焦国家战略,顺应发展趋势,把握前进方向,正确城市定位,那么,上海有条件有能力走出一条服务经济比较发达、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资源消耗持续降低、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的新路。

心有灵犀

## 出击“热钱”,尚有多种选择

袁宜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经济博士

流动性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中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它的一大根源在于海外资金的汹涌流入,通过贸易或者资本项下的顺差,结汇形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面对蜂拥而来的海外资金以及急剧增长的外汇储备,国内外人士给出了两帖不同的药方。

以外国政府当局和跨国金融机构为首的一方建议,人民币汇率应当快速升值。然而,鉴于我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大多处于弱势地位,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或者一步到位式的跳升这种升值模式因其缺乏足够的缓冲,很可能令出口企业顷刻间陷入困境。考虑到出口企业对拉动我国就业,特别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所做的巨大贡献,快速大幅升值很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和社会出现震荡,因而老外开具的药方并不为国人所接受。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选择了人民币小步升值,央行增加基础货币对冲力度以及放松资本流出管制相结合的方案。首先,人民币汇

的压力,在股实的外汇储备的支撑下,加快取消对资本流出的管制成为了“顺理成章”的政策选择,但其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在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的情况下,境内资金缺乏投资海外的冲动。QDII产品自问世以来所面临的销售困境就是一个例证。还有,开放资本流出的举措在客观上为游资未来的撤离提供了便利,一旦将来人民币升值到位,套利资金转而寻求其他投资途径,游资将通过更通畅的流出渠道集体撤离,这很可能酿成我国金融的动荡。当然,更令决策者难料的是,资本流出便利为游资的撤退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游资在当下争先恐后地涌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要破解上述困境,现行政策需要微调。一方面,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早日完成升值的进程,这应当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对当前加速放松资金流出来缓解外汇储备增长压力的做法作一定的修正,对游资的肆意流入需有一定的封堵,这也有其必要性。

在目前我国激增的贸易顺差中,有相当比例并非来自真实的贸易。据发改委的最新统计,去年我国177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有逾四成来自进出口的虚报。而且,当前虚增贸易顺差的动机已由单纯

骗取出口退税转变为套汇与骗税并举。出口企业报高出口金额,虚增部分则由意图进入我国的游资填补,这已成海外游资潜入国内的一大渠道。此外,利用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便利,借用部分外资企业注册资本和实际到位资金之间的缺口,假借汇入资本金的名义,行套汇之实,这也成为了游资进入的重要途径。这俨然已归入洗钱的范畴,理应通过反洗钱程序给予打击,一则可以规范金融秩序,二则可以将游资堵截于国门之外,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以及央行进行基础货币对冲的压力。

由于游资所假借的渠道在表面上具备合法性,因而对游资的识别以及对主要流入渠道的规范

求索

##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之死——“漫走早稻田”之六

站在全球化浪尖上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年前因“女友人事件”被告发,却迟迟不肯引咎辞职,最后还是以“对世界银行、对全球穷人、还有对他自己最后的救赎”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终结职业生涯。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被媒体披露出涉嫌财务丑闻之后,毅然悬梁自尽。两位公众人物完全不同的结局,让人不能不感慨日本与美国文化的悬殊距离。

在外人眼里,日本的高自杀率始终是个难解之谜。西方学者曾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结构非常热衷,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游离在东西方文化边缘的社会结构,偏爱自杀的文化特征是最能反映大和民族与西方人的心理结构差异,日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尽管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地吸收了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制度与思想要义,强调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崇尚独立、自由的理念也开始陆续进入日本传统社会,但他们始终还是丢不开日本自古以来的那种文化优越感和强烈的自尊心,还是希望活在那个传统的、彼此依赖的“义理人情”社会中,希望在这样一个和睦的集体文化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平和、稳定以及具有安全感的情感。在这种封闭、内向的社会心理结构中,人们的行动价值更多的不是来自于自身的判断,而是集团内

部成员的外在压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在这个和睦的集体主义社会中,这一“义理人情”文化的意识形态能在最大限度上制止集体内部成员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家对社会制度运转中的强制成本,这就形成了在最小成本上运作的国家发展模式。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变得非常强盛,尤其是在一个基于野蛮权力而不是交易的世界规则体系中,这样的文化体系将体现出极富战斗力的侵略他国或者抵抗他国侵略的防御能力,从而成为这一世界体系的强权霸主。

但这一文化体系除了向外扩展的强大战斗力之外,也有可能在内出现崩裂的状态。集体内部过多的规则约束导致那些内心本来就脆弱的日本人彻底走向逃避,甚至自我毁灭。因此,在好战性格下,孤僻、脆弱、极端则是日本性格的另一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的观察最为精辟。在日本,人的成长曲线是倒U型曲线,这刚好与其他社会相反。在孩提和老人阶段有着极大的自由和任性,而到成家立业之后其规则约束也达到了极点。每年3万青年人的自杀,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最终让日本人走向自杀的,还是日本

知耻文化下那种对生命的极其淡漠和无视。在基督教文化里,自杀是罪孽、懦弱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是无法面对现实的懦弱表现,而在日本传统文化中,自杀是对失败负责的行为、一种谢罪形式,是值得尊敬的勇敢表现。本尼迪克特将这两种文化称之为“源于罪恶感的西方文化”与“源于知耻感的日本文化”。前者注重的是个人心灵深处的内向行为规范,希望从自我罪恶的反省和超越中形成自身的行为判断,自我仍在这里占据中心的作用,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始终如影随形。虽然这一文化是很难被教化,但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不容易轻易倒戈变向。而后者的知耻文化注重的是外部社会的外向压力规范。他们本身并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他们希望从强者的行动规范中感染和指导整体的前进方向。虽然这一文化表面上容易被教化的,尽管很快形成一致性的行动方向,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知耻文化是极其不牢靠的,他们的努力方向和价值判断会随着强者的更替而不断地更替变化。从盛唐时的中国,到荷兰、英国、德国,再到现在的美国,日本的方向总是变化的,而无法固定在某个点上。哪里有比他们更强的强者出现,他们的领导者学习方向就会指向哪里,整个国家的国民也会随之转到哪里。

难。而这个人并不一定是组织的底层,很有可能是上层领导。

如此,我们就明白堂堂的农林水产大臣为何会选择自绝之路。据日本众议院事务局透露,松冈利胜是战后第7位自杀的日本在职国会议员。可以想象,今后如果再有麻烦事出现,仍会有更多的议员来自杀谢罪。安倍在上任之初,支持率一度达到七成,但内阁官员不断传出丑闻和失言风波,包括厚生大臣称女性是生育机器,防卫大臣久间章生批评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还有就是松冈利胜大臣涉及的办公室开支丑闻,使得安倍的支持率急剧下滑。松冈自杀前安倍的支持率已经到了去年9月上台以来的最低点,《每日新闻》的民调支持率只有32%,相对比较保守的日经民调也显示只有41%。这时,重量级政客松冈利胜为了让年轻的安倍政府顺利渡过眼前的难关,更不想因自己的丑闻而影响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于是自我了断,以逃脱国民对安倍政府丑闻的问责,同时也使得共事多年的其他成员能够保全。自杀之前,他还留下了6份遗书,对安倍晋三和其他涉事者一再道歉,明明是他用生命成全了别人的事业,但反过来却要向别人道歉。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逻辑啊!但这恰恰就是最真实的日本人。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